

口头叙事与先秦语类文本的生成

余建平

内容提要：语类文本是先秦时期最活跃文献类型之一。它们多数源于瞽史等群体的口头讲诵，是口耳相传的口头文本，其后在流传的过程中被书写记录，成为《国语》《左传》以及诸子百家语的重要来源之一。口头讲诵者借助重复词句、程式句法、同部韵字、主题、叙事结构等单元，生产、记诵和传播语类文本，以使听众领悟历史经验，树立良好德行。以口头叙事视角研究先秦语类文本有三点重要意义：一是丰富了中国的口头叙事理论，二是促进对口头和书面文本关系的认识，三是深化对中国早期文本生成和流传过程的理解。

关键词：口头叙事 语类文本 口头程式 文本生成

引言

近些年，中国早期文本的生成问题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诸如古书的单元、流传、改写、作者等问题，引发了学者的持续讨论。^①在众多研究方法中，口头程式理论提供了一个较为特殊的视角。口头程式理论（又称帕里—洛德理论）由美国学者帕里（Milman Parry）和洛德（Albert B. Lord）师徒在研究荷马史诗和前南斯拉夫史诗的过程中提出。帕里和洛德认为，史诗歌手并非逐字逐句背诵演唱史诗作品，而是依靠程式（formula）、主题或典型场景（theme or typical scene），以及故事型式或故事类型（story-pattern or tale-type）三个层次的结构单元来记忆、传承和说唱史诗。^②帕里和洛德师徒的学说甫一提出，便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口头程式理论在近百年间迅速被各大洲众多的研究者接受，研究对象从古希腊文学和前南斯拉夫史诗，扩展到来自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北美洲和南美洲众多传统的史诗、民谣、历史性韵文等样式中，成为影响散布于世界各地、超过一百五十种彼此独立的传统研究的理论基础。^③

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帕里和洛德的口头程式理论亦被研究者接受，并形成了较多富有影响的成果。如王靖献以该理论研究《诗经》的套语、主题及其口头传播方式。^④柯马丁（Martin Kern）通过对传世

① 参见徐建委《文本革命：刘向、〈汉书·艺文志〉与早期文本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3—87页；李锐《从出土文献谈古书形成过程中的“族本”》，《同文与族本：新出简帛与古书形成研究》，上海：中西书局，2017年，第215—228页；刘跃进《有关唐前文献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刘跃进、程苏东主编《早期文本的生成与传播：周秦汉唐读书会文汇》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3—28页。

② 约翰·迈尔斯·弗里《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译者导言”，朝戈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5页。

③ 约翰·迈尔斯·弗里《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作者中译本前言”，朝戈金译，第4—5页。

④ 王靖献《钟与鼓——〈诗经〉的套语及其创作方式》，谢濂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155页。

与出土文献的文本对比,进一步指出《诗经》等文本在中国早期口头传播的特点。^①熊良智通过对《楚辞》文本的细致分析,指出《楚辞》的“重著”现象与其早期口头传播有密切关系。^②近些年,有些学者以口头叙事视角研究中国早期史传的口头生成和传播问题。如魏玮对《国语》《晏子春秋》的文本生成与口头讲诵关系的揭示^③,井长海对《左传》口头叙事的研究^④,等等。从以上学者的研究可看出,口头程式理论在中国早期各类文本的研究中已得到有效开展,并产生了较多具有影响力的成果。

在中国早期文献中,除《诗经》《楚辞》等韵文外,语类文本与口头传统的关系最为密切。语类文本成分复杂,来源广泛,先秦两汉文献或将之记为“说”,或称为“传”“语”^⑤。现代学者有的将其称为“事语”^⑥,有的称其为“说体”^⑦,也有的将其命名为“语”或“语类文献”^⑧。本文称其为“语类文本”,它主要包含两部分内容:其一是以言语对话为主体,又带有一定情节性的叙事体文献;其二为先秦时期流行的嘉言善语,如格言、古谚等,叙事性较弱。因言语是这类文献的核心内容,因此将之命名为语类文本。它们主要集中在《国语》《左传》《晏子春秋》《管子》等诸子史传,亦多见于出土文献,如清华简《晋文公入于晋》《子犯子余》《殷高宗问于三寿》以及上博简《用曰》,等等。

语类文本多数为源自口头讲说或口耳相传而后被书写记录下来的文本,与口头传统关系密切。正如廖群所言,先秦“说体”为源自讲说而后被记录成文的叙述体文本。^⑨李零也指出,先秦诸子百家引用的故事传说,往往有口语化的外貌和通俗化的形式,很多都是口口相传,带有追忆的性质,最后由文化精英用书面语再创造,把它们传递下去。^⑩因口头传播不易保存的缘故,多数语类文本的口头特征早已在书写的过程中被删削,但从传世和出土文献仍可看到口头传播留下的深刻痕迹。正如帕里和洛德对荷马史诗、前南斯拉夫史诗的研究所指出的,口头诗人并不完全依靠记忆背诵诗歌,而是借助程式、主题、故事型式等结构单元来完成史诗的演唱。对于中国先秦时期的口头讲诵者而言,他们也会借助一些技巧帮助其讲诵故事。下文将分为口头叙事程式、口头叙事主题、口头叙事结构三个层次,对这类讲诵技巧予以探究。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① 柯马丁:《方法论反思:早期中国文本异文之分析和写本文献之产生模式》,李芳、杨治宜译,陈致主编《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上古史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84页。夏含夷对柯马丁的观点持反对意见,认为书写文本在《诗经》早期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起重要作用,参见夏含夷《出土文献与〈诗经〉口头和书写性质问题的争议》,孙夏夏译,蒋文校,《文史哲》2020年第2期。

② 熊良智:《口头传统与文人创作——以楚辞的诗歌生成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8期。

③ 魏玮:《从重复叙事看〈国语〉的口头讲诵性质》,《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魏玮:《〈晏子春秋〉口诵性研究》,《学术研究》2018年第2期。

④ 井长海:《〈左传〉的口头叙事研究——以重耳故事为例》,《民俗研究》2022年第1期。

⑤ 参见廖群《“说”“传”“语”先秦“说体”立说》,《先秦说体文本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第15—102页。

⑥ 参见张政烺《〈春秋事语〉解题》,《文物》1977年第1期;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修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273页。

⑦ 参见廖群《先秦说体文本研究》,第114页。

⑧ 参见俞志慧《古“语”有之:先秦思想的一种背景与资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页;夏德靠:《先秦语类文献形态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3页。

⑨ 参见廖群《先秦说体文本研究》“引言”,第1页。

⑩ 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修订本),第267页。

一 先秦语类文本的口头叙事程式

帕里和洛德口头程式理论中的“程式”(formula) ,是指在相同的格律条件下为表达一种特定的基本观念而经常使用的一组词。这些程式能够帮助歌手补齐音节,调和音韵,包括表示角色的名字、主要行为、时间、地点等惯用词语。^①这是基于荷马史诗等长篇叙事史诗提出的,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先秦的语类文本。语类文本的口头叙事程式相对复杂,并不单指表达特定观念的词汇,而是包括词句、句法、韵读等多种程式化的内容。它们帮助讲诵者记诵故事,调和韵律,从而达到音韵铿锵、娓娓动听的讲诵效果。根据相关实例,可归纳出三种主要的程式:重复词句、程式句法和同部韵字。

(一) 重复词句

尹虎彬指出,口头传统诗歌“最明显的特点之一便是程式的重复。书面诗歌不能容忍大量的重复,但在口头诗歌,没有什么比重复更具有特点了,因为它是口头程式创作方法中特有的产物”,“诸如首语重复、句尾重复、直喻、隐喻,以及各种叙事单元的组合,它们在口头传统诗歌中运用是先于书面创作的,并由后来的书面诗歌所继承”。^②尹虎彬指出了口头文本与书面文本最显著的区别之一,即语词的重复。书面文本受材料、书写等限制,讲究用词简约有效,不太可能浪费较多篇幅书写重复的词句,而口头文本并不存在这一问题,因此重复词句可作为判断某一文本是否来源于口头传统的重要依据。

《诗经》的重章叠句现象尤为突出。王靖献指出:“《诗经》诗句总数是 7284 行,而全句是套语的诗句是 1531 行,即占《诗经》总句数的 21%。这一数字恰好通过了杜根在分析古代法语诗歌时所作的‘口述创作’的限定线。”^③所谓口述创作的限定线,是指杜根(Joseph J. Duggan)分析古法语叙事诗《罗兰之歌》得出的结论:“我想作这样的具体限定:总的说来,如果纯粹的重复少于 20%,那么它就可能是来源于书面的或书写的创作,而当套语分布密度超过了 20%,即可证明它是口述创作。”^④此外,熊良智发现屈原诗歌重复诗句共 264 句次,涉及屈原的 18 篇诗歌,是屈原及楚辞作家对诗歌的一种艺术表现方式。^⑤

先秦语类文本的重复词句现象也较为常见。口头演说者在讲诵传说故事时,必须借助一定的手段帮助记忆,重复词句较好解决了这一问题。清华简第七辑有一篇被整理者命名为《晋文公入于晋》的文献:

晋文公自秦入于晋,端坐□□□□□□□□□□母,毋察于好臧媸斐皆见。明日朝,属邦耆老,命曰:“以孤之久不得由二三大夫以修晋邦之政,命讼狱拘执释折,责毋有异,四封之内皆然。”或明日朝,命曰:“以孤之久不得由二三大夫以修晋邦之祀,命肥菽羊牛、豢犬豕,具黍稷酒醴以祀,四封之内皆然。”或明日朝,命曰:“为稼蓄,故命淪旧沟、增旧防,四封之内皆然。”或明日朝,命曰:“以吾晋邦之间处仇讎之间,命蒐修先君之乘式车甲,四封之内皆然。”^⑥

① 阿尔伯特·贝茨·洛德《故事的歌手》,尹虎彬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0、46页。

② 尹虎彬《古代经典与口头传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04页。

③ 王靖献《钟与鼓——〈诗经〉的套语及其创作方式》,谢濂译,第57页。

④ 转引自王靖献《钟与鼓——〈诗经〉的套语及其创作方式》,谢濂译,第55—56页。

⑤ 熊良智《口头传统与文人创作——以楚辞的诗歌生成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8期。

⑥ 参见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七),上海:中西书局,2017年,第101页。本文所引为宽式释文,后文所引出文献皆为宽式释文,不再一一说明。此外,引文中下划直线部分为重复词句,后文亦是如此,不再一一说明。

从下划线部分可看出《晋文公入于晋》中“明日朝，命曰……四封之内皆然”这一程式重复了四次，命令的具体内容则稍加变化，这是典型的口头叙事特征。对讲诵者而言，他们只需记住命令的具体内容，程式化的重复词句不需刻意记诵。对听众而言，重复出现的词句帮助他们快速捕捉讲诵者的重点，利于他们理解口头文本之意。

清华简第七辑中与《晋文公入于晋》合编的另外一篇名为《子犯子余》的文献：

□□□耳自楚蹠秦，处焉三岁。秦公乃召子犯而问焉，曰：“子若公子之良庶子，胡晋邦有祸，公子不能止焉，而走去之，毋乃猷心是不足也乎？”子犯答曰：“诚如主君之言。吾主好定而敬信……”

少，公乃召子余而问焉，曰：“子若公子之良庶子，晋邦有祸，公□□□止焉，而走去之，毋乃无良左右也乎？”子余答曰：“诚如主之言。吾主之二三臣……”^①

《子犯子余》记载了秦穆公与晋文公重耳的两位辅佐者子犯、子余的对话。秦穆公问了两个尖锐的问题，晋国有难，重耳不得已出走，是不是因为重耳“心是不足”和“无良左右”，子犯和子余分别予以回应。从文本内容看，秦穆公的两次问话非常相似，子犯和子余回答的开头部分完全相同，后半部分明显有别。这篇与《晋文公入于晋》的情况一样，口头讲诵者借助了重复词句，以构建口头文本的基本框架，只在子犯和子余回答的具体内容上变化，这应是口头讲诵留下的痕迹。

重复词句在传世语类文本中也极为常见。最典型者为《国语》，如《国语·吴语·勾践灭吴夫差自杀》：

王乃之坛列，鼓而行之，至于军，斩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以环瑱通相问也。”明日徙舍，斩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从其伍之令。”明日徙舍，斩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于御儿，斩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②

这段的程式为“明日徙舍，斩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它与清华简《晋文公入于晋》的程式非常相似，均只改变命令的具体内容，以重复词句为主要叙事框架。又如《国语·吴语·勾践灭吴夫差自杀》的另一段：

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后，内政无出，外政无入。内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见子于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阖左阖，填之以土，去笄侧席而坐，不扫。

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内有辱于国，是子也。军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后，内政无出，外政无入，吾见子于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乃阖左阖，填之以土，侧席而坐，不扫。^③

这段文本记载了越王勾践对夫人和大夫的命令，两段内容非常相似，如王的站位、夫人和大夫的站位、王的命令内容、王离开后夫人和大夫的反应等，几乎完全一样，只有个别字句和部分语序略作调整，与清华简《子犯子余》的程式较为相近。类似的词句重复现象还有《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晋文公与子犯的对话、《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晋文公与狐偃的对话、《国语·吴语·勾践灭吴夫差自杀》越王勾践与申包胥

①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七），第92页。

② 徐元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59页。

③ 同上书，第558—559页。

这段话包含两种程式句法：一是“为□□之旗师以□”，二是“为□旗□出”。之所以使用两种程式句法，应是为避免同种句法重复次数过多，以使讲诵的节奏有所变化。此外《晏子春秋·内篇杂上·景公夜从晏子饮晏子称不敢与》、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等语类文本也存在程式句法现象，兹不赘述。

总体而言，程式句法没有特定的规律，视讲诵者的需要而定。对于口头讲诵者来说，程式句法主要起两种作用：一是方便记诵，它与重复词句一样，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讲诵者只需在句子中替换个别字词，即可轻松记忆；二是使句式更为齐整，程式句子之间，字数大体相同，句式齐整，口头讲诵时会产生琅琅上口、整齐动听的听觉效果。

(三)同部韵字

洛德在研究前南斯拉夫史诗时发现，一部史诗“至少有一个不断重复的韵律模式，用以支撑持续的叙述”，“没有音乐的文本在展示史诗歌的面貌时是有缺憾的”。^①可见韵律是口头文本极为重要的特征，中国早期诗歌如《诗经》《楚辞》等，均为押韵的韵文。除诗歌外，先秦语类文本也存在较多押韵现象，可见口头讲诵者亦借助韵调帮助其记忆口头文本。

传世先秦文献如《左传》《国语》《逸周书》《晏子春秋》等书有大量韵语。姑举《晏子春秋·内篇谏上·景公异荧惑守虚而不去晏子谏》为例，晏子向齐景公解释为何齐国受荧惑守虚之罚：

且天之下殃【阳】，固于富强【阳】，为善不用，出政不行【阳】，贤人使远，谗人反昌【阳】，百姓疾怨，自为祈祥【阳】，录录强食，进死何伤【阳】。是以列舍无次，变星有芒【阳】，荧惑回逆，孛星在旁【阳】，有贤不用，安得不亡【阳】！^②

此段所押为阳韵，殃、强、行、昌、祥、伤、芒、旁、亡等押同部韵的字便是此段的口头程式。出土文献中押韵现象亦不少见，如清华简第六辑《管仲》。据子居研究，《管仲》绝大部分文句押韵，分别押之、职、真、药、鱼、幽、文、元、歌、阳、蒸、耕、东、侵、宵等韵部。^③姑举其中一段：

桓公又问于管仲曰：“仲父，亦微是，其即君孰彰【阳】也？”管仲答：“臣之闻之也，夫周武王【阳】，甚元以智而武以良【阳】，好义秉德，有孜孜不懈，为民纪纲【阳】。四国和同，邦以安宁，民乃保昌【阳】。凡其民人，界务不偷，莫爱劳力于其王【阳】。若武王者，可以为君哉！及幽王之身，好使佞人而不信慎良【阳】。夫佞有利气，笃利而弗行【阳】。若幽王者，不可以为君哉！”^④

这段文本以四字句为主，句式整齐，并主要押阳韵，它最早的来源很可能是口头文本。该段的彰、王、良、纲、昌、行等字便属于口头程式。

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也是一篇押韵的语类文献。据整理者介绍，此篇简文假托殷高宗武丁与三寿（少寿、中寿和彭祖）对话的形式阐述作者的思想观念。^⑤《殷高宗问于三寿》的前半部分有较多重复词句和程式句法现象，并且全篇押韵。据整理者归纳，全文涉及的韵部有侵、阳、微、耕、之、歌、职、真、文、

① 阿尔伯特·贝茨·洛德：《故事的歌手》，尹虎彬译，第51页。

② 张纯一撰，梁运华点校《晏子春秋校注》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54—55页。

③ 子居：《清华简〈管仲〉韵读》，2017年1月14日，<https://www.xianqin.tk/2017/01/14/363/>，2023年3月7日。

④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六），上海：中西书局，2016年，第112页。

⑤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五），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第149页。

支、物、质、侯等。^①除此之外,清华简《子犯子余》^②、上博简《三德》^③《用曰》^④等篇亦多押韵。

我们可以看到,尽管重复词句和程式句法已使口头讲述者记诵的难度大为降低,但部分非程式化的内容记忆起来难度还是很大,如上文所举清华简《管仲》和《殷高宗问于三寿》,想要完整地讲诵这些内容,并不容易。押韵字在此过程中起关键作用,它们将文段切分为一个一个节奏点,讲诵者在反复训练的过程中,逐渐将这些韵调内化于心,讲诵时韵律化的内容自然流出,难度大为降低。同时,这类押韵的语类文本在乐器的伴奏下,往往会产生节奏分明、音韵铿锵、回环往复的口诵效果,有利于激发听众的兴趣,使其在不知不觉中接受讲诵者欲传达之意。

二 先秦语类文本的口头叙事主题

“主题或典型场景”(theme or typical scene)是口头程式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洛德认为:“主题是用词语来表达的,但是,它并非是一套固定的词,而是一组意义。”^⑤它们是歌手以程式化的文本讲述故事时所使用的,是在史诗或其他口头性文本中经常出现的场景或情节,如英雄的着装与战斗、英雄的死亡,等等。基于长篇叙事史诗归纳的“主题”概念,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先秦语类文本。先秦语类文本篇幅相比长篇史诗更为短小,叙事性偏弱,典型场景或情节较少在特定文本内重复出现,但在不同的文本中经常重复。因此,本文借用口头程式理论的“主题”概念,将其定义为在同一或不同语类文本中经常出现的场景或情节。在现存语类文本中,有几个主题经常出现,如战争条件、选贤黜恶、治理民众、后宫迫害、英雄遭难—流亡—回归,等等。^⑥

最典型者是战争条件主题。先秦语类文本有一类经常出现的情节,某位君主询问臣子是否可以发动战争,臣子多次给予否定回复,并分析该如何做才能取胜,可称为战争条件主题。最典型者是前文所举《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晋文公与子犯的对话。晋文公流亡返国后,欲发动战争,子犯先后回复“民未知义,未安其居”“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民未知礼,未生其共”。子犯的回答揭示出战争成功与否的关键,如果晋文公不先修义、信、礼,则无法使民众安居乐业,战争便不可能成功,这便是战争条件主题。这类主题在先秦语类文本中经常出现,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所记晋文公与狐偃的对话:

晋文公问于狐偃曰:“寡人甘肥周于堂,卮酒豆肉集于宫,壶酒不清,生肉不布,杀一牛遍于国中,一岁之功尽以衣士卒,其足以战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弛关市之征而缓刑罚,其足以战民乎?”狐子对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丧资者,寡人亲使郎中视事,有罪者赦之,贫穷不足者与之,其足以战民乎?”狐子对曰:“不足。此皆所以慎产也,而战之者,杀之也。”

①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五),第160—161页。

② 子居:《清华简七〈子犯子余〉韵读》,2017年10月28日, <https://www.xianqin.tk/2017/10/28/405>, 2023年3月7日。

③ 俞绍宏称《三德》多韵语,且有句读符号。参见俞绍宏《上海博物馆藏楚简校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412页。

④ 俞绍宏称《用曰》篇中诸节之间每见叶韵现象,对楚方言音系研究极具参考价值。参见俞绍宏《上海博物馆藏楚简校注》,第508页。

⑤ 阿尔伯特·贝茨·洛德:《故事的歌手》,尹虎彬译,第97页。

⑥ 井长海对战争条件和后宫迫害主题亦有分析,参见井长海《〈左传〉的口头叙事研究——以重耳故事为例》,《民俗研究》2022年第1期。

民之从公也，为慎产也，公因而迎杀之，失所以为从公矣。”^①

狐偃即子犯，与前文一样，该文的两个对话人物也是晋文公与子犯，但其具体内容迥异于《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该文以晋文公之问开头，寡人采取如此措施，“其足以战民乎？”询问狐偃是否可以发动战争，狐偃对曰：“不足。”如此重复了三次。文中出现了重复词句，可见这一传说最早应来源于口头文本。仔细比对《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与《左传·僖公二十七年》的记载，虽然两者具体文字差异很大，但其核心主题非常相似，均为探讨发动战争之条件。

与之相似者，还有越王勾践传说。《国语·吴语·勾践灭吴夫差自杀》载，楚申包胥出使于越，勾践询问其战胜吴国之关键。勾践先后以俭朴生活、尊老爱幼、修令宽刑、安富救贫、团结外邻等事，询问申包胥是否可以战胜吴国，然而申包胥皆回复“善则善矣，未可以战也”，如此重复五次。^②文本出现了较多重复词句和程式句法，应是源自口头文本。这一情节与上文所举《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晋文公与狐偃的对话极为相似，皆用战争条件主题。《国语·吴语·勾践灭吴夫差自杀》的另一段文本，也与战争条件主题有关。越王勾践召集五大夫，询问战胜吴国之条件，五位大夫分别回答：

大夫舌庸乃进对曰：“审赏则可以战乎？”王曰：“圣。”大夫苦成进对曰：“审罚则可以战乎？”王曰：“猛。”大夫种进对曰：“审物则可以战乎？”王曰：“辩。”大夫蠡进对曰：“审备则可以战乎？”王曰：“巧。”大夫皋如进对曰：“审声则可以战乎？”王曰：“可矣。”^③

文中有明显的程式句法现象，与前文一样，应是来自口头文本。五位大夫分别探讨了赏、罚、物、备、声五种战胜吴国之条件，一问一对共五次，勾践方认为条件成熟。前文所举诸例为君主发问，此处为臣子发问，稍有不同，但它的情节模式与前文所举诸例极为相近，也属战争条件主题。此外，《国语·越语》勾践与范蠡的对话也与战争条件主题有关。

战争条件主题的流行，与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君主谋求富强称霸这一大背景有关。当时的口头讲诵者为回应君主的期待，利用相似的情节，以君臣对话为主体结构，创造了较多这类主题故事。他们通过这类故事教导听众君主，要想取胜，关键条件是勤修内政、爱护民众。这些故事后被书写记录下来，成为语类文本非常重要的一类主题。

选贤黜恶类故事在先秦语类文本中亦颇为常见，如《国语·齐语·管仲佐桓公为政》：

正月之朝，乡长复事。君亲问焉，曰：“于子之乡，有居处好学，慈孝于父母，聪慧质仁，发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桓公又问焉，曰：“于子之乡，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贤，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桓公又问焉，曰：“于子之乡，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长悌于乡里，骄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④

从文本内容看，该文表现出明显的程式化特征，应是来自口头文本。值得注意的是，《国语·齐语·桓公为政既成》有与《管仲佐桓公为政》相似的文本，只有少数细节略作变化。如《管仲佐桓公为政》齐桓公

① 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卷一三，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327—328页。

②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修订本），第556—557页。

③ 同上书，第557—558页。

④ 同上书，第225—226页。

所问为乡长,所以称“于子之乡”,而《桓公为政既成》齐桓公所问为五属大夫,所以称“于子之属”^①。除此之外,两章的叙事情节极为相似,齐桓公选拔贤才与黜退恶人的情节在不同文本内重复出现,可称为选贤黜恶主题。

又《国语·齐语·管仲对桓公以霸术》载,齐桓公询问管仲该如何管理民众,管仲认为应让士、农、工、商四民分处,不使其杂居:

令夫士 群萃而州处。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为士。^②

管仲认为,应将士人群聚在一起,在日常生活中谈论义、孝、敬、悌,以使士人子弟在潜移默化中不劳而能。这种叙事方式在后文的工、商、农中重复出现,如论述工匠的一段:

令夫工 群萃而州处,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协材,旦暮从事,施于四方,以饬其子弟,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陈以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为工。^③

两者的叙事方式极为相近,其主题为探讨如何教导士、工,使其安居乐业。商、农两段的叙事方式亦是如此。治理四民这一情节在《管仲对桓公以霸术》这一文本内共重复出现了四次,可将之称为治理民众主题。选贤黜恶和治理民众主题的出现与流行,和战争条件主题一样,与春秋战国时期君主对国家实现富强的期待有关。除此之外,先秦语类文本还有后宫迫害^④、英雄遭难—流亡—回归^⑤等主题故事,因篇幅限制,兹不赘述。

主题在口头文本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尽管故事的人物、具体内容会有一些变化,但相关主题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以战争条件等主题为例,它们在口头讲诵者口中代代相传,这与其具备较强的现实意义有关。对于讲诵者来说,这类主题能启发听众君主理解治理国政的要害,如教民以礼、选拔良才、改革刑法等。君主在日常接受这类口头信息熏染的过程中,也逐渐将故事的训诫之义内化于心,这就起到“朝夕诵善败而纳之”^⑥的作用。

三 先秦语类文本的口头叙事结构

故事型式(story-pattern)是口头程式理论最大的结构单元。洛德指出,在口头传统中存在诸多故事型式,无论围绕它们建构的故事有多大程度的变化,它们作为具有重要功能并充满巨大活力的组织要素,存在于口头故事文本的创作和传播之中。洛德通过对英雄归来史诗的分析,总结出缺席、劫难、重归、复仇和婚礼五个要素序列。^⑦借助故事型式,口头讲诵者可以将故事放置于稳定的框架内,按照既定的发

①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修订本),第229页。

② 同上书,第219—220页。

③ 同上书,第220页。

④ 参见井长海《〈左传〉的口头叙事研究——以重耳故事为例》,《民俗研究》2022年第1期。

⑤ 如春秋战国时期广为流行的晋文公和齐桓公的传说,他们的遭难、流亡与回归,即属于此类主题。

⑥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修订本),第452页。

⑦ 约翰·迈尔斯·弗里:《口头诗学 帕里—洛德理论》,朝戈金译,第109页。

展模式创造和演述故事。由宏大叙事史诗总结出的故事型式是一种大型结构概念,中国先秦语类文本毕竟小型说理文,并不完全适用。根据先秦语类文本的相关实例,可看出这类文本也有组织和展开叙事的固定结构,本文将其称为“口头叙事结构”。它们不仅能有效帮助演述者记诵故事,还能起推进故事、衍生情节的作用,也更能激发听众的兴趣,便于听众理解故事的旨趣。语类文本的口头叙事结构类型颇多,本文只选取问对、线性、押韵三种最典型者予以揭橥。

(一)问对体

先秦语类文本设定的背景多为君臣或师徒之间的对话,其文本性质以问对体为主。它们一般以一问一对的形式结构全篇,通常问者为君主或弟子,对者为臣子或师傅。问对体可细分为问对递进结构和问对平行结构两种。

问对递进结构是指对者以不断否定问者的方式,逐渐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叙事结构。最典型者是《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关于晋文公称霸的叙述。晋文公返国两年后,欲用其民,子犯先后以“民未知义,未安其居”“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民未知礼,未生其共”,提醒晋文公须先教民以义、信和礼。^①《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晋文公与狐偃的对话亦是如此。晋文公先后以施民以食、缓赋税刑罚、存问贫穷等事问狐偃“其足以战民乎”,狐偃皆回以“不足”,并认为“此皆所以慎产也,而战之者,杀之也”。^②这也是问对递进结构。

前文所引《国语·吴语·勾践灭吴夫差自杀》所记越王勾践与楚国申包胥的对话也是同样的叙事结构。越王勾践先后以俭朴生活、尊老爱幼、修令宽刑、安富救贫、团结外邻等事,问申包胥“求以报吴,愿以此战”,申包胥回复曰“善则善矣,未可以战也”,如此共往复五次。^③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也是递进叙事结构。殷高宗先后问少寿、中寿、彭祖“何谓长?何谓险?何谓厌?何谓恶?”三寿分别给予回复。^④从少寿到彭祖,他们的回答为递进式叙事结构。

问对递进结构在先秦语类文本中最为流行。对于讲诵者来说,这种结构有利于他们不断衍生故事情节,如以三、四、五、七的结构形式不断递进展开故事,对于听众来说,这种结构能有效调动其兴趣,故事的核心主旨在层层否定递进的过程中展开,听众的探索兴趣被逐步激发。

问对平行结构指的是问对各段之间不具备递进关系,而是以平行的形式结构全篇。如《晏子春秋·内篇杂上·景公夜从晏子饮晏子称不敢与》:

景公饮酒,夜移于晏子之家。前驱款门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于门,曰:“诸侯得微有故乎?国家得微有事乎?君何为非时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声,愿与夫子乐之。”晏子对曰:“夫布荐席、陈簠簋者有人,臣不敢与焉。”

公曰:“移于司马穰苴之家。”前驱款门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于门,曰:“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为非时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声,愿与夫子乐之。”穰苴对曰:“夫布荐席、陈簠簋者有人,臣不敢与焉。”^⑤

①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447页。

② 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卷一三,第327—328页。

③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修订本),第556—557页。

④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五),第150页。

⑤ 张纯一撰,梁运华点校《晏子春秋校注》卷五,第241—242页。

从以上两段引文看,下划直线为重复词句,下划波浪线为程式句法,可见这一文本最早应是来自口头文本。从叙事结构看,两者并不存在递进关系,而是平行结构。前文所引清华简《子犯子余》也是如此,秦穆公与子犯、子余的两段对话并不存在递进关系,也是平行结构。又如《国语·齐语·桓公帅诸侯朝天子》,齐桓公先后问管仲“南伐”“西伐”“北伐”应以哪个国家为主,管仲一一予以回答。^①该文出现了重复词句和程式句法现象,可见是口头文本。齐桓公和管仲的三次问答不存在递进关系,该文属平行叙事结构。《国语·晋语·郤献子等各推功于上》所记晋平公与郤克、范燮、栾书三人的对话,亦属此类叙事结构。

(二)线性体

线性体是指以时间顺序线性叙述故事的一种叙事结构。中国古代的史官文化极为发达,史官记述历史最重要的一种方式,是按照事物时间发展的顺序安排史料。先秦口头讲诵者也常以时间为序,线性地向君主讲述传说故事。对于君主来说,线性体有利于他们把握事件发生的前因、过程和后果,理解传说故事传达的旨意。

线性体最典型的特征是“时间词”的重复出现,如前文所举清华简《晋文公入于晋》,“明日朝”重复出现四次。“明日朝”便是时间词,它以时间逐日变化的方式推动故事的发展,是整篇文本的叙事框架。前文所举《国语·吴语·勾践灭吴夫差自杀》也是如此,“明日徙舍”共重复三次。有的语类文本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时间词,但根据文义,可知这类故事是按时间发展而结构全篇的。如前文所举《国语·齐语·管仲佐桓公为政》《桓公为政既成》两章,它们有重复词句和程式句法,是较明显的口头文本。这两章在齐桓公的每问之后,皆出现了“有司已于事而竣”^②,共重复三次。“竣”即完成之意,暗含着时间的流逝,可见贯穿两章的叙事线索为时间的变化,两者属线性体叙事结构。

对于讲诵者来说,线性体有利于他们从时间发展的角度叙述故事,结构简单,更容易记诵。对于听众来说,时间词相当于故事发展的节点,当时间词出现,听众便知道新的情节即将开始,这更容易激起他们的兴趣。

(三)押韵体

押韵体是指以韵读的变化组织全篇的一种叙事结构。前文已提到,有些先秦语类文本是押韵的,讲诵者借助押韵字记忆口头文本。但叙事程式的同部韵字与押韵体并不完全相同,同部韵字是部分语类文本的韵律特征,是指某段文本出现较多押同一韵部字的程式化现象,而押韵体是指口头讲诵者借助韵读的变化,组织、展开和衍生口头文本的手段,是部分语类文本内在的叙事结构。

以上博简《用曰》为例,此篇为嘉言善语的汇集,是典型的语类文本。篇内每一小节在简单陈述后即以“用曰”缀以短语作结。“用曰”所引者,多为引以为戒、足以致用之嘉言。^③篇中多见押韵现象,如第一支简:

思民之初生,多险以难成【耕】。示之以康乐,匿之以凶刑【耕】。心目及言,是善败之经【耕】。

三节之未得,舍命乃索【耕】。^④

这一段押的是耕韵,成、刑、经、索等为同部韵字,是口头程式。再看第二支简:

^①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修订本),第231—232页。

^② 同上书,第226、229页。

^③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85页。

^④ 本文参照俞绍宏的释读,并用宽式释文。参见俞绍宏《上海博物馆藏楚简校注》,第509—510页。

简简疏疏 事非与有方【阳】。称秉重德 冒难犯殃【阳】。非抚于福 亦力勉以毋忘【阳】。^①

这一段押的是阳韵,方、殃、忘同部韵字是口头程式。但从第一支简的耕韵变为第二支简的阳韵,以及该篇每段换一韵,以耕、阳、月、质、铎、真、阳、之、鱼、文、职、叶、侵、元等韵的变化组织全篇,该篇属于押韵体。除此篇外,上博简《三德》与《用曰》相似,章与章之间没有明确的逻辑关系,而以韵读的变化结构全篇。清华简《管仲》《殷高宗问于三寿》《子犯子余》等篇也押韵,既属押韵体,也属问对体。

对于讲诵者来说,押韵体最重要的功能是易于记诵,尤其是《用曰》《三德》这类章与章之间没有逻辑关系的文本,不像问对体、线性体那样具有明显的叙事线索,很难记诵。通过记诵韵读的变化,讲诵者才能掌握这类文本。对于听众来说,押韵体语类文本往往音韵和谐,并且每一韵读的变化,都提醒听众新的内容已经出现,其兴趣可被有效激发。

四 先秦时期的口头讲诵者

先秦时期活跃着众多口头讲诵群体,他们中最为重要者是瞽矇或瞽史。《庄子·逍遥游》曰:“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②韦昭注《国语》曰:“无目曰瞽。”^③可见瞽即目盲者,矇与瞽一样,也是目盲者。《说文》:“矇,童蒙也,从目,蒙声,一曰不明也。”^④因目盲之人听力发达,所以古代乐官往往为瞽矇。《诗·周颂·有瞽》:“有瞽有瞽,在周之庭。”郑笺曰:“瞽,矇也,以为乐官者,目无所见,于音声审也。”^⑤瞽矇在先秦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据《周礼·春官宗伯》载:“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⑥

瞽矇本为乐师,其最主要的职能是“作为重要的演奏人员参加国家重大祭祀仪式,既有宗教职能,又有音乐职能”^⑦。此外,瞽矇的重要职责是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诵诗献曲的方式规谏君主。《左传·襄公十四年》记师旷之言:“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⑧《国语·周语上》记邵公谏周厉王之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瞽诵,百工谏。”^⑨

瞽矇除诵诗献曲外,也常以口诵的方式向君主讲述历代兴盛衰亡之事,这类瞽矇常被称为“瞽史”。《国语·周语下》记单子之言:“吾非瞽史,焉知天道?”^⑩《国语·楚语上》记左史倚相之言,君主“临事有瞽史之导”^⑪。《周礼·大行人》:“王之所以抚邦国诸侯者,岁遍存,三岁遍覩,五岁遍省,七岁属象胥,谕言语,协辞命,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⑫可见瞽史在先秦是一个相当活跃的群体。

除去诗、曲外,瞽史讲诵的主要是传说故事和嘉言善语,它们可以增长君主的历史知识,提高治政的

① 俞绍宏:《上海博物馆藏楚简校注》,第511页。

② 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4页。

③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修订本),第11页。

④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卷七,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35页。

⑤ 毛亨传,郑玄笺,陆德明释文《宋本毛诗诂训传》卷一九,第3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第153页。

⑥ 郑玄注,贾公彦疏《宋本周礼疏》卷一八,第6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第19页。

⑦ 魏玮:《先秦史传的口头叙事研究》,西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43页。

⑧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1017页。

⑨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修订本),第11页。

⑩ 同上书,第83页。

⑪ 同上书,第501页。

⑫ 郑玄注,贾公彦疏《宋本周礼疏》卷四四,第11册,第68页。

水平。瞽史讲诵的这些口头文本,经历代传播而逐渐被书写记录下来,成为众多经典文献的史料来源之一。徐中舒在研究《左传》的作者及成书时指出:“史官所记录的简短的历史,如《春秋》之类,还要通过瞽矇以口语传诵的方式,逐渐补充丰富起来”,“瞽矇传诵的历史再经后人记录下来就称为《语》,如《周语》《鲁语》之类;《国语》就是记录各国瞽矇传诵的总集”。^①诚为卓见。《国语》提到关于瞽史的典籍,《国语·晋语》记齐姜对晋文公重耳之言:“《瞽史之纪》曰:‘唐叔之世,将如商数。’”^②《国语·晋语》载董因对晋文公之问:“《瞽史记》曰:‘嗣续其祖,如谷之滋。’”^③所谓《瞽史之纪》《瞽史记》均为瞽史口头讲诵的传说故事,后被书写记录下来之文本。

除去瞽史这一群体外,先秦时期的卿士、史官等群体,皆可能口述故事。如《国语·晋语》载史黯对赵简子之问:“夫事君者,谏过而赏善,荐可而替否,献能而进贤,择材而荐之,朝夕诵善败而纳之。”^④这里的“事君者”应是指当时在朝的官员,他们经常“诵善败”,口头讲诵古今胜败兴衰之故事,以为君主提供历史鉴戒。《国语·楚语》载楚王孙圉对赵简子之问:“楚之所宝者曰观射父,能作训辞,以行事于诸侯,使无以寡君为口实。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⑤观射父是“作训辞”,“作”即撰作之意,是书面文本,而左史倚相为“能道训典”,“道”即口头讲述之意,是口头文本。左史倚相是楚国的史官,可见史官也是口头讲诵语类文本的一个重要群体。此外,《左传·襄公四年》记载了魏绛引用的《虞人之箴》,该篇全文押韵且为整齐的四言体式。虞人是掌管田猎之官,他们代代口传夏禹兴盛、夷羿灭国的传说,因魏绛引用而被书写记录下来。^⑥

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亦是口头文本的重要传播者。《管子》《晏子春秋》《韩非子》《吕氏春秋》等诸子书保存了大量语类文本,它们有的来自当时广泛传播的口头文本,被诸子书写记录下来,如前文所举《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所记晋文公与狐偃的对话,以及《晏子春秋》中的部分晏子传说^⑦;有的源自老师口授学生的讲诵记录,最典型者是《论语》。当然也不排除有一些为诸子模仿口头表达而形成的书面文本。在口头文本转变为书面文本的过程中,战国诸子可能起了关键作用,因材料所限,这一问题只能留待将来探究。

五 先秦口头传统研究的意义

钱锺书在评《左传·庄公十年》鲁庄公与曹刿之事指出:“‘可以一战,战则请从。’按曹刿与庄公三问三答。《国语·吴语》越王勾践以伐吴问申包胥,五问五对,又《越语》下勾践以伐吴问范蠡,六问六对;《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晋文公以‘其足以战’问狐偃,七问七对;三人始皆曰:‘未可以战也’,‘未可也’,‘不足’。机杼与《左传》此篇剧类,唯收稍各异。事之相类与?抑纪事之相仿耶?”^⑧钱锺书已敏锐注意到各篇叙事模式的相同之处,但他对造成此现象的原因并未深究。如以口头叙事视角研究则会豁然开朗,这类

① 徐中舒:《〈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历史教学》1962年第11期。

②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修订本),第325页。

③ 同上书,第345页。

④ 同上书,第452页。

⑤ 同上书,第526页。

⑥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938—939页。

⑦ 魏玮:《〈晏子春秋〉口诵性研究》,《学术研究》2018年第2期。

⑧ 钱锺书:《管锥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294页。

文本的最早来源其实是口头文本,口头讲诵者采用了相近的情节讲述故事。由此例可知,中国早期发达的口头叙事传统因书写文化的发展和兴盛而被日渐遮蔽,以致我们对口头传统产生了很大的隔阂。幸运的是,当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中国早期口头传统的研究。从口头叙事视角研究先秦语类文本,至少有以下几点意义:

其一,丰富了中国的口头叙事理论。中国的口头传统研究在近数十年已得到长足发展,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史诗、叙事诗、民间故事、民歌、民间小戏等多种文类的百余种文本。^①先秦文学研究领域的成果相对较少,且主要体现在《诗经》《楚辞》等诗歌研究中。中国先秦时期史传诸子所记载的语类文本,亦与口头传统有密切关系。从前文的论述可看出,语类文本有其独特的讲诵者、传播方式和听众,在具体的口头程式、主题、叙事结构等方面,与《诗经》、民歌、民间故事、史诗等口头文本也有明显差异。因此,从口头叙事视角研究语类文本,不仅极大地扩展了中国口头传统研究的材料范围,而且语类文本所表现出的口头传播和接受特征、口头文本形态、口头叙事特点等,对中国口头叙事理论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补充。

其二,促进我们对中国早期口头文本与书面文本关系的认识。随着出土文献的大量发现,学界对中国早期的书面文本已有更清晰的认识。将以语类文本为代表的口头文本与先秦时期的书面文本进行比较,可看出两者大致的异同。如从文本的生成、形态、传播、接受等角度看,书面文本与口头文本有较明显的区别:从文本的生成角度,书面文本多由士人或专业抄手书写或铸刻在简牍、丝帛、甲骨、青铜、碑石等物质材料上,尤以简牍最常用,多数简牍文本书写精美,具有视觉的审美性;口头文本多由乐师瞽史创造、记诵,诉诸听觉,注重讲诵的琅琅上口、娓娓动听。从文本的形态看,书面文本一般逻辑严密,较少重复词句,句式多变化;口头文本则多重复词句,句式较整齐,多押韵,具有较明显的口语色彩。从文本的传播角度,书面文本便于复制,如果书写有误,可通过删削、插字、涂改等方式进行调整,可保证文本的相对准确性;口头文本的变异性较强,在传播的过程中,故事的人物、情节等均可能发生较大变异,形成多种故事变体,但其核心情节模式相对稳定。从文本的接受角度,书面文本可被公开阅读,也可由读者一人私下完成,且读者可通过添加符号、注释、评论等方式,与所阅读文本形成互动;口头文本的讲诵与接受须在同一时空下进行,文本的接受过程相对公开,听众在接受和传播口头文本的过程中,可能会改变内容。

尽管有诸多不同,口头文本与书面文本并不截然相斥,两者有紧密关系。口头文本因口头传播的缘故,不易保存,要么在流传过程中逐渐消亡,要么被书写记录下来,转化为书面文本。可以说,如果不被书写记录,绝大部分口头文本会在流传的过程中消亡,也包括先秦语类文本,正是借助书写才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口头文本。但口头文本的转化并非原本原样地进行,因书写文字、书写材料、书写者等各方面因素的限制,口头文本所特有的语气词、程式化用语等,在转化为书面文本的过程中多数会被摈弃。在认识到口头文本与书面文本的异同及转化关系的基础上,依靠书面文本,从中寻找口头文本遗留的痕迹,全面收集整理先秦时期的口头文本,是当前急需进行之工作。

其三,深化我们对中国早期文本生成和流传的理解。针对中国早期文本的生成和流传问题,近年来随着出土文献的发现,已涌现大量的研究成果。有些学者关注文本流传的单位,认为“章”是早期文本流

^① 参见郭翠潇《口头程式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应用——基于中国知网(CNKI)期刊数据库文献的实证研究》《民族文学研究》2016年第6期。

传的最小单元。^①有些学者关注早期文本生成过程中的衍生和异质现象。^②有些学者关注文本之间的关系,建立各类模型和理论予以解释,如李锐以“族本”理论解释相似文本的关系。^③以上研究的对象为书面文本,其研究成果并不完全适用于口头文本。口头文本有其独特的生成和流传途径。口头讲诵者擅长借助重复词句、程式句法、押韵、叙事结构、叙事主题等创作和讲诵故事。从口头文本自身的特点看,其最小单元是重复词句、句法、韵读等程式,这与书面文本关注“章”不同。

此外,口头讲诵者并没有一个必须依照的固定书面文本,他们会根据讲诵的场合、听众的反应,随时增添或压缩部分情节,改变故事的部分要素,从而形成多种多样的变体。帕里和洛德在研究前南斯拉夫歌手时得出这样的结论:“史诗演唱者的每一次吟诵都是一种再创作。”^④这一结论也适用于中国先秦时期瞽史等人,他们的每一次讲诵几乎都会产生新的口头文本。如果以从书面文本出发而得出的衍生型文本、族本等理论,研究口头文本的生成和流传问题,会产生很多困惑,如谁为族本?谁为衍生型文本?等等。将口头文本作为独立于书面文本的研究对象,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中国早期文本生成和流传的理解。^⑤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出土文献与中国早期‘相似文本’的生成研究”(项目编号:22CZW014)阶段性成果。

(余建平,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王尧】

① 徐建委《文本革命:刘向、〈汉书·艺文志〉与早期文本研究》第17页。

② 程苏东《写钞本时代异质性文本的发现与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③ 李锐《同文与族本:新出简帛与古书形成研究》第215—228页。

④ 尹虎彬《古代经典与口头传统》第205页。

⑤ 本文蒙匿名审稿专家提示宝贵意见,谨致谢忱!